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之谜研究综述*

戴 翔

内容提要:针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之谜的成因探讨,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课题。本文对这一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发现,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成因之争,主要集中在到底是周期性因素(也称短期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也称长期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综合来看,虽然现有文献已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探讨贸易增速变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素,并且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但基本上都以单一因素分析为主且缺乏动态考察。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而分工发展则主要由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推动。因此,如何基于分工演进这一本质把各种因素的变动及其影响纳入统一、动态的分析框架,深刻剖析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作用机理,并从总体、国别、产业和产品等细分层面开展更加严谨的实证检验,应是将来研究的重点。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原因,进而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贸易增速下降 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

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致使2009年全球贸易出现了后来被学术界称为贸易大崩溃(trade collapse)的大幅衰退(Bems et al, 2013)。面临危机冲击,在全球主要国家联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下,2010年和2011年全球贸易出现了表面上的恢复性反弹,然而在接下来的2012—2015年连续四年里,全球贸易增速回落至2.88%、3.66%、3.30%和-2.17%的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的疲软状态,远远低于1985—2007年间6.85%的年均增长率。实际上,即便2010年和2011年分别出现12.73%和6.7%的“表面性”反弹,但却是“实质性”增速下降,因为其是建立在2009年全球贸易“大崩溃”的基期效应基础之上的。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如果以2008年作为基期,那么2010年和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回暖显然就是假象。由此可见,自2009年以来全球贸易实质上已经结束了过去长达几十年的繁荣,进入了低速乃至负增长通道。这种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全球贸易增长的巅峰时期似乎已经过去,全球贸易已经进入到一个低速增长的

“新常态”发展期(Hoekman, 2016)。

毫无疑问,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对外贸易仍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能够创造就业和收入,而且也是解决赤字和降低债务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别是在当前各国外贸依存度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状况将对贸易变动更为敏感。贸易增速下降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减弱,甚至对于某些国家而言会拖累经济增长。因此,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无疑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极大担忧。厘清贸易增速下降的原因,据此探寻提升贸易增长的有效对策,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学术界对此掀起了有关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之谜的研究热潮,并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

针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成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当然,这本身也说明了影响贸易增速的因素是众多的,且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如此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究竟何者起着主导作用,哪些因素只是起着一般意义的影响作用。大体而言,影响贸易增速的原因

* 戴翔,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邮政编码:211815,电子邮箱:aufedx@163.com。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我国外贸增速变化机理及对策研究”(16AJY018)。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无非有两类：一类是短期性的，即源于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贸易增速暂时性下降。比如，发生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的全球贸易增速下滑乃至崩溃，普遍观点认为就是由于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因素所致。另一类是长期性的，即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导致的贸易增速下降。当前，对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成因的争论焦点就在于，到底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而识别不同的主导因素，显然意味着不同的政策含义。如果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其潜在的政策含义是，贸易增速下降或者说不景气更多是暂时性的，伴随经济活动的回暖尤其是产出增长，必然带动新一轮贸易增速反弹。相反，如果是结构性因素所致，那么贸易增速下降将可能出现持续性特征。

一、贸易增速下降之谜：周期性因素探源

综合来看，从周期性因素角度探寻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成因的文献，其代表性的论点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疲软论、投资需求不足论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论。

（一）消费需求疲软论

坚持周期性因素起主导作用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消费需求疲软论。有消费需求，才会有最终商品的交换，因此消费需求的大小决定着交换的规模。从这一意义上看，国际市场上可贸易商品的需求状况对相应时期全球贸易状况起着主导性作用（OECD，2015）。经济周期性因素的典型表现就是全球总消费需求，尤其是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总消费需求疲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贸易增速变化。有研究表明，经济周期性因素对贸易的影响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危机冲击期间。换言之，除了具有短期影响效应之外，往往还会在一定时期内都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负面影响（Freund，2009；Abiad et al，2014）。时至今日，距离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已近8年，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却并未完全消散，诸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贸易品的主要“需求大户”，经济活动仍然处于相对疲软的状态，市场需求不足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种“常态”，进而影响着全球贸易增速（Duval et al，2014）。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贸易增速的变化还会因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传导而产生相互的影响和动

态作用（Alessandria & George，2010）。正是基于这一意义，作为国际市场主要消费需求方的发达经济体，其总消费需求不足会导致进口消费需求下降，必然会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绩效和出口收入水平下降，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水平的下降。这种负反馈效应同样又会作用于发达经济体，致使发达经济体可能因此更是“雪上加霜”，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总消费需求进一步疲软。这种负反馈效应的不良作用机制如此往复循环，最终导致出现不利于贸易增长的“全球需求弱化”格局。

作为经济不景气下总需求疲软重要表征之一的进口需求下降，无疑是影响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从主导作用的角度看，以需求疲软为表现的所谓经济周期性因素，是否是造成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之谜的根本原因？对此，有学者进行了特征事实分析乃至计量检验，从而力图给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经济周期性因素主导作用提供必要的经验证据。比如，Boz et al（2014）的研究从三个层面来证明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主要是由周期性因素所致。首先，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数据进行特征事实分析，结果显示，当前进口需求下降主要集中在危机冲击“重灾区”的发达经济体，并且从受影响的贸易品角度看，对投资品需求的下降要甚于对消费品需求的下降，从而为经济周期性因素导致的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提供了初步的佐证。其次，通过借鉴Bussière et al（2013）的模型框架，定量研究了经济周期性因素在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中的贡献度，采用18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贸易增速下降的大部分能够被经济周期性因素所解释。最后，作为一个对比分析，作者从商品结构等角度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所谓结构性因素虽然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具有一定的促成作用，但作用效果极其有限。因此综合来看，是经济周期性因素主导着全球贸易增速变化。Duval et al（2014）通过对贸易增加值和贸易总值变化的对比分析同样发现，无论是采用哪种核算方法，其变化总是具有顺周期特征，其背后的逻辑表明经济周期性因素是导致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主导因素。

（二）投资需求不足论

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分，而相对于前者，投资需求更具有双重属性，即从短期来看其“需求”特征更为明显一点，而从长期来看，其“供给”特

征即生产行为更为明显一点,因为投资会形成生产能力进而最终成为“供给侧”。由于需求和供给(生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即从有效的需求和供给角度看,二者互为前提,需求需要供给来满足,而供给必须依赖于需求的支撑。由此不难推断,当最终消费需求不足时,必然反映在对供给层面的冲击。换言之,从与需求相对应的生产面角度看,最终消费需求疲软必然反映在生产领域,即导致产出受到冲击,而产出的减少显然会降低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即对投资前景看衰或信心不足,导致企业家投资需求减少,相应地出现产能收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其所产生的重要溢出效应就是对投资需求品进口的减弱以及对作为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需求减少(Amitiy & Weinstein, 2011)。毫无疑问,这一逻辑同样是促成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当然,对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度量或者表征,实践中通常有两种测度方法:一是通过贸易量的变化来说明贸易增速变化;另外一种是通过贸易额的变化来表示贸易增速的变化。与前者相比,后一测度方法的采用更为普遍。当以贸易额的变化来表示全球贸易增速变化时,由于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更多地以货币形式表示,因此在受到贸易量变动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贸易品价格变动的影 响(Buturac, 2013)。其内在的逻辑和作用机制表现为,在国际市场供给面尚未做出相应调整前,由于投资需求的下降,供需规律的作用机制必然促使可贸易的投资品价格呈现下调,投资需求量的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投资品需求价格的下降,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以货币表示的贸易额下降。因此,当从贸易额角度考察全球贸易增速时,全球贸易增速的变化,确切地说,既与投资需求不足或者说投资需求本身萎缩有关,也与投资需求品价格的下降有关(Engel & Wang, 2012)。关于这一点,国内外有些学者已经从贸易品价格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发现,投资品价格尤其是全球大宗贸易品的价格下跌,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具有重要的促成作用(Chinn et al, 2014)。实际上,以货币表示的全球贸易额增速下降,不仅源于投资需求不足领域,对于消费需求不足领域而言,同样也是如此。

Ollivaud & Schwellnus(2015)通过构建标准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全球贸易和产出之间的长期弹性关系。所谓全球贸易和产出之间的弹性关系,

主要是指产出变化所带动的贸易变化程度,即当全球产出增长 1%时,全球贸易增长的百分率。研究结果表明,1986—2007 年间全球贸易和 GDP 之间的长期弹性较为稳定,即产出的变化带来的贸易增速的变化是基本稳定的,2008 年之后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即出现了不稳定现象。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贸易与全球 GDP 之间弹性关系的变化并非是结构性变化,而主要是源自于周期性因素变化,比如投资需求的下降以及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减少等。上述研究发现和检验结果在相关的研究分析中也能够得到相应的佐证和说明。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 2014)一份研究报告就曾分析指出,在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期间,全球投资水平呈下降趋势,从而意味着从全球 GDP 构成看,更多地转向诸如政府消费和私人非耐用品消费等更具低进口倾向的经济活动,从而导致了全球贸易的增速暂时性下滑。OECD(2013)的一份调查报告也同样指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投资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反弹的良好变化趋势,但所谓的投资反弹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增加,从贸易的角度看,由于基础设施的进口依赖倾向相对较低,即大部分投资是不依赖进口的,因此,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呈现反弹式增加,但却由于通常表现为低进口倾向而难以拉动贸易恢复性反弹。这就意味着,伴随危机冲击阴霾的逐渐消散,顺经济周期下的其他投资需求反弹必然带动贸易的重新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5)近年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同样显示,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中的私人投资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比重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而主导着全球贸易增速的变化趋势,即投资需求不足是造成全球贸易增速下滑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说

作为经济周期作用的重要表征,除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外,还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从而影响着贸易发展。既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期间,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会相伴而来并持续一段时间(Constantinescu et al, 2014)。始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然也不会例外,伴随危机冲击向实体经济领域的渗透和蔓延,作为危机冲击“重灾区”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应付短暂的经济衰退和失业等经济社会问题,将采取一些消

极的“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以作为应对危机冲击的“权宜之计”(Evenett, 2011)。更为重要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这种“以邻为壑”的特征将容易产生“报复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蔓延(Kee et al, 2013)。针对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和特征开展的大部分文献研究发现,相比危机前各国相继采取了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对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具有一定影响(Evenett, 2013; Gawande et al, 2015),虽然影响程度有限,但作为开放条件下经济周期的作用因素之一,必然协同着经济周期内其他因素,共同主导着全球贸易增速下降这一变化趋势(WTO, 2014;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二、贸易增速下降之谜:结构性因素探源

经济周期性因素无疑对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全球贸易迟迟未能出现实质性反弹和恢复以及全球主要国家采取的“凯恩斯主义”宏观刺激政策收效甚微的事实特征,促使很多学者力图从长期因素即结构性因素角度探讨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大体而言,影响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全球生产布局结构性变化说、全球贸易品结构性变化说、全球贸易参与国变化说以及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变迁说等。

(一)结构性解释的基本依据

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周期性因素固然重要,但不能解释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全部,甚至不应该被视为主导因素。例如,Escaith & Mironoudot(2015)最近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对周期性因素在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评估。作者构建了同时考虑总需求不足和贸易保护影响两种因素的计量模型,以发达经济体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周期性因素至多只能解释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中的一半,显然,剩下的一半甚至更多则需要从结构性因素中寻找答案。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可能由结构性因素变动所致,也能够从贸易的收入弹性即全球贸易增长率与全球GDP增长率之比的动态变化中得到说明。Constantinescu et al(2015)通过测算发现,在2000年之前的约40年间,贸易的收入弹性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1986

—2000年间,全球贸易收入弹性的平均值约为2.2,即全球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全球贸易将相应地增加2.2个百分点。然而,这一关系自进入2000年的新世纪以来却发生了变化,全球贸易收入弹性表现出了下降趋势,其中,2001—2013年间全球贸易收入弹性的平均值仅约为1986—2000年间的一半。这种变化显然暗含了其中的结构性因素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Lemoine et al(2015)的分解分析则进一步表明,需求不足在危机冲击年份及其经济复苏的前一年中对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最近几年其作用已明显减弱,相对而言,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中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换言之,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不仅仅是因为全球GDP增长缓慢,更重要的是由于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从而使得贸易对GDP的敏感性也越来越弱。

(二)全球生产布局结构性变化说

从全球生产布局结构性变化角度看,当代国际分工的主导模式是全球价值链,即不同的生产环节和阶段被按照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而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有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中间产品贸易增加是促成前一轮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Hummels et al, 2001)。然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5)最近的一项统计调查研究表明,以中间产品贸易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步伐自2000年以来正在趋缓。如果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主导因素确实是由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演进步伐放缓所致,那么不难预期,基于贸易附加值核算出的全球贸易额将会与传统总值核算法的全球贸易额更加接近,或者说两种核算方法得出的贸易额差距就会不断缩小。对此,有关附加值贸易的测算研究的确对上述预期给予了证实(Goldberg et al, 2010; Kee & Tang, 2014)。甚至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传统的国际分散化的价值链分工模式可能会出现逆向调整,即同一产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不再被配置到不同国家和地区,而是将被重新组织到某个特定国家和地区进行更为完整的一体化生产,从而出现全球生产网络向国家和地区生产网络的“蜕变”(Srinivasan, 2014)。当然,这种所谓的“蜕变”并非意味着分工模式重新回到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老路,而是因为诸如3D打印等新技术革命会内生地要求产品生产

的不同环节和阶段在空间和时间上实现更加完美的无缝对接(Donnan, 2014)。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大势根本不可能出现扭转(Gangnes et al, 2014)。

(三)全球贸易品结构性变化说

从全球贸易结构性变化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服务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等内在特征,从而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贸易性产品(Broussolle, 2014),因此相比较而言,对全球贸易的研究也更多地集中于货物贸易,更确切地说,集中于制成品贸易而非服务贸易领域。也正是因为如此,目前对全球贸易增速下降讨论的焦点也主要侧重于制造业部门。然而,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服务贸易规则的不断推行,如同全球经济结构不断向“软化”方向发展一样,全球贸易结构也呈现不断向服务倾斜的重要发展趋势(Jensen & Kletzer, 2006)。针对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现象,有学者从贸易结构的角度进行了分解和对比分析(Miroudot et al, 2013),研究结果表明,增速下降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部门而非服务业部门。近年来,尽管全球服务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制造业部门贸易相比,一方面其基数仍然偏小,另一方面,服务贸易领域所面临的壁垒和成本要相对更高,因此在短期内很难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Jafari & Tarr, 2014)。目前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仅为 20%左右的事实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实质是贸易结构性变化所致,即全球经济结构正在不断趋于“软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制成品贸易的产业基础,致使全球制成品贸易增长乏力(Broussolle, 2014)。显然,在全球贸易中制成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全球贸易的增长状况主要决定于制成品贸易状况,由全球产业结构演进和调整而导致的制成品贸易增长不力,引发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是结构性因素变化的必然逻辑。

(四)全球贸易参与国变化说

从全球贸易参与国的变化角度看,有学者研究指出,基于贸易收入弹性指数衡量,无论是 2000 年之前的全球贸易高速增长,还是之后全球贸易呈现的增速下降趋势,实质上都与贸易参与国的变化因素有关。Feenstra & Wei(2010)的研究就曾指出,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模式,对全球贸易高速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贡献。类似地,诸如印度等新兴市场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中来,都对全球贸易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Aziz & Li, 2008; Feenstra & Wei, 2010; Bhagwati & Panagariya, 2014)。然而,诸如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从而在影响甚至改变世界贸易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包括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比较优势变化以及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等,而这些变化同样会影响着全球贸易的总体发展状况。比如,有些研究指出,发展中经济体在获取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其自身的生产要素价格也会不断趋于上升,从而弱化了传统比较优势,使得其传统出口部门增长动力衰竭(Li et al, 2012; Ceglowski & Golub, 2011; Yoshitomi, 2003)。也有研究指出,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的中国)自身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升级以及配套能力的不断增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作为中间投入的许多进口品正日益地被国内生产所替代,从而对全球贸易增速带来了不利影响(Gaulier et al, 2013)。此外,中国更加注重内需市场开拓,转变以往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策略(Davies, 2013),也会对全球贸易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当然,对此也有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裴长洪(2014)就认为,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实质上与中国进口需求变化并无实质性关联。

(五)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变迁说

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角度看,毋庸置疑,开展贸易的前提是国家间相互开放或者说自由化,显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深入演进为贸易高速增长提供了便利和制度保障,突出表现为 WTO 主导下的全球贸易规则顺利推行以及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快速发展,这种制度安排为贸易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Amiti & Konings, 2007)。在实践中,表现为伴随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获得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得以大幅度地削减乃至消除,等等。然而,以 WTO 为主导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基本完毕,甚至有学者认为,如不进行必要的改革, WTO 有可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理查德·杨盼盼, 2013)。当然,导致这种尴尬困局的主要

原因可能是 WTO 现有制度安排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分工发展新需要(盛斌,2014)。但不论原因如何,其背后的逻辑显然表明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已经显著放慢脚步了。原有的制度安排所能释放的贸易增长红利已经基本释放完毕,而新的制度安排却又尚未实质性形成,因而从贸易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保障角度看,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也就在所难免(Houseman & Mandel, 2015)。总之,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或者至少可以说进程放缓,而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制度安排,基本上与经济周期并无必然联系,作为长期的结构性因素,的确有碍于

全球贸易的新一轮增长。

三、贸易增速下降之谜:探析方法的综合对比

表 1 进一步梳理了当前关于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主要影响因素的识别文献,这不仅有助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其研究内容和主要核心观点,更重要的是可以反映出当前对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成因的解读以及现有文献所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而对现有研究文献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进行总结和梳理,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现有研究进展及核心观点的说服力。

表 1 贸易增速下降成因研究文献梳理

因素识别	代表性文献	主要研究方法	核心观点及结论	
周期性因素	需求疲软论	OECD(2015); Abiad et al(2014); Dugal et al(2014); Boz et al(2014)	定性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事实特征描述性统计;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周期作用下的需求不足拖累了全球贸易增长。
	投资不足论	Amity & Weinstein (2011); Buturac (2013); Engel & Wang (2012); Chinn et al(2014); Ollivaud & Schwelnuus (2015); WTO(2014); OECD(2013); IMF(2015)	对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性描述及历史对比分析;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对周期性因素的可能影响进行识别。	经济周期下生产开工不足,导致对包括进口投资品在内的投资需求不足,制约了贸易增长。
	贸易保护论	Evenett(2011); Constantinescu et al(2014); Kee et al(2013); Evenett(2013); Gawande et al(2015); WTO(2014); European Commission(2015)	基于历史分析法,探讨危机冲击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及其对贸易的可能影响;对危机冲击前后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经济危机冲击期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必然之势,进而对全球贸易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导致贸易增速下降。
结构性因素	全球生产布局结构性变化说	Goldberg et al(2010); World Bank(2015); Kee & Tang(2014); Srinivasan(2014); Donnan(2014); Gangnes et al(2014)	利用附加值核算法对传统总值核算法进行改进,基于新的统计数据从生产布局角度对贸易及其增速进行重新认识。	贸易增速变化与贸易数据统计方式密切相关,从贸易附加值角度看,贸易增速在危机冲击前后并无实质变化。
	全球贸易品结构性变化说	Broussolle(2014); Miroudot et al(2013); Jafari & Tarr(2014)	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关系的角度,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对贸易增速变化进行分析,提供商品结构层面的直观认识。	全球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尤其是趋于“软化”侵蚀了作为贸易主导的制造业规模基础,从而影响贸易增速。
	全球贸易参与国变化说	Feenstra & Wei(2010); Bhagwati & Panagariya(2014); Li et al(2012); Ceglowski & Golub(2011); Gaulier(2013); Davies(2013)	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停留在猜想层面,即从贸易参与国比较优势变化等角度说明对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影响。	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大国融入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贸易高速增长,而比较优势的变化反过来又使得贸易增速下降。
	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变迁说	Houseman & Mandel(2015); 巴德温等(2013)	以定性分析为主,基于 WTO 等提供的制度框架及其变迁,解释对贸易发展的影响。	WTO 主导下的原有制度框架已经不适应全球分工和贸易发展新趋势,需要适应性变革。
	其他方面	Escaith & Miroudot(2015); Constantinescu et al(2015); Lemoine et al(2015)	以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为主。	周期性因素难以解释贸易增速下降,应从结构性因素角度探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1 总结的情况来看,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成因的探讨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大体可分为三种:(1)基于历史的经验数据或者经验现象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滑进行判断和推断。历史经验虽然

可以借鉴,但是分工和贸易模式等因素的变迁可能会出现一些与历史经验不相一致的作用机制,对现实问题的讨论更应该“与时俱进”。(2)对现有统计数据相对简单和直观的统计性描述和分析,从

数据变化当中导出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特征和表现,进而推断出可能的影响因素。应该说,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认识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现象,但是由于缺乏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深度检验,从而能否据此说明某些因素是否成为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主导因素,实际上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3)主要采用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对可能的影响因素在计量层面上力图进行识别。较之于简单的统计性描述,应该说,这种方法识别出的影响因素更能够用于解释全球贸易增速下降问题。但是综观这一方面的现有研究文献仍然存在着两个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的地方:一是采用实证研究和计量分析的样本数据相对有限,因而大大制约了计量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二是实证分析和计量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识别,缺乏必要的、有深度的理论分析作为支撑。

四、结论性评述及展望

针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这一重要现象,犹如2009年危机冲击下出现的贸易“大崩溃”一样,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成因,究竟是经济周期性的短期因素,还是结构性的长期因素,目前尚无形成统一认识和定论。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客观而论,各种因素都在一定程度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应该说,既有文献已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探讨贸易增速变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素,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拓展空间,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第一,既有研究文献大多以单一因素分析居多,无论是关注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基本上都是侧重于某一视角的研究。显然,这种单一视角和单一因素的分析方法难以揭示各因素可能产生的交互作用与综合作用对贸易增速变化的影响。此外,即便是单一因素和单一视角的研究也大多属于静态分析,缺乏动态考察。换言之,既有的研究还未能把各种因素变动及其影响纳入统一、动态的分析框架来进行研究,对于诸因素变动对全球贸易增速的影响效应还缺乏深入的机理分析和严谨的实证检验。

第二,全球贸易增速下降虽然是一个整体性现象,但从个体角度来看,可能并不完全相同。比如,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产业部门以及不同的产品在贸易增速变化方向上是具有一致性还是差异性?显然,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不同产品角度看,其贸易增速变化应该是不同的。比如,有些产品的出口增长会下降甚至转为负增长,有些产品出口反而可能增长较快,等等。那么,这些差异性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是与经济周期性因素有关还是与结构性因素有关,抑或是哪种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差异性能否在统一、动态的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释,从而在国家、区域、产业和产品层面进一步检验各影响因素的实际作用和大小。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显然需要专门、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第三,缺乏从分工演进视角的深度剖析。虽然现有文献已经涉及对全球价值链问题的关注,并且指出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出现的“逆转”对全球贸易增速的深刻影响。然而,一方面正如现有文献仍然存在争议一样,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是否会发生“逆转”仍然值得商榷,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另一方面,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出现“逆转”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仍然是当代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那么在同样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为何会出现前期的高速增长和后危机时代的增速下降乃至负增长的巨大反差呢?全球贸易增速变化机理是不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程度和速度有关?对于这些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给予更为深刻、细致和具有说服力的研究。

第四,现有研究对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关注仍然有待加深。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贸易的增加源自于分工扩大,而分工发展则主要由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所推动。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此间的突出特点是,前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分工深化和前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形成的制度红利,其动力机制已基本衰竭,正在等待新科技革命崛起和全球经济新规则的形成及普遍推行,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范式变革还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的分工深化尚未露出端倪。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新规则同样尚未实质性形成并进入普遍推行阶段。从这一意义上看,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除受既有文献揭示因素的可能影响外,显然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大背景有关,也与分工演进的阶段性特征等因素有关。据此,如何从理论上阐

述清楚科技革命和全球经济规则等制度变迁在微观和宏观上对产业发展、分工格局和分工形态的影响,据此构建基于分工演进的贸易增长理论分析框架,明晰技术和制度变革推动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及总体趋势特征对全球以及单个国家贸易增速的影响机理,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第五,现有研究在方法上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现有文献所采取的几种主要研究方法,所得结论虽不无启发意义,但囿于统计数据等因素约束,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时代特征”还缺乏有深度的理论分析。换言之,将分析仅仅停留在对有关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及其相关关系的简单识别上是远远不够的。新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下,无论是贸易的增长还是贸易的衰退,都可能出现与以往不完全一致的内在变化机制。经济和贸易理论总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明晰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作用机理,只有建立在有深度理论剖析基础之上并辅以必要计量检验等方法加以实证的结论,才将更为可靠和可信。唯有如此,才能更加正确地认识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变化的本质原因,并据此提出科学有效的应对之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贸发展取得了被学术界所津津乐道的“爆炸式”增长奇迹。然而,面临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在全球贸易增速进入低速乃至负增长的大通道背景下,中国外贸发展也出现了“乏力”现象,甚至深陷“低迷泥沼”。因此,深入了解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之谜的成因所在,对于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应对举措促进中国外贸的持续、健康和高水平发展,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理查德·巴德温 杨盼盼,2013:《WTO 2.0:思考全球贸易治理》,《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裴长洪,2015:《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经济研究》第4期。
 盛斌,2014:《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国际贸易》第2期。
 佟家栋 刘程,2013:《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吴福象 刘志彪,2009:《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的微观经济分

析:1978—2007》,《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Abiad, A. et al(2014), “How does trade evolve in the aftermath of financial crises?”, *IMF Economic Review* 62(3): 213—247.
 Alessandria, J. & B. George(2010), “Inventories, lumpy trade, and large deval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5):2304—2339.
 Amiti, M. & J. Konings(2007),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5):1611—1638.
 Amity, M. & D. Weinstein(2011), “Exports and financial shock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2):1841—1877.
 Aziz, J. & X. Li(2008), “China’s changing trade elasticities”,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16(3):1—21.
 Bems, R. et al(2013),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5(1):375—400.
 Bhagwati, J. & A. Panagariya(2014), “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81(1):263—264.
 Boz, E. et al(2014), “Recent slowdown in global trade: cyclical or structural”, VoxEU.org, 12 Nov.
 Broussolle, D. (2014), “Service, trade in services and trade of services industrie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48(1): 31—58.
 Bussière, M. et al(2013), “Estimating trade elasticity: Demand elasticity and the trade collapse of 2008—09”,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5(3):118—151.
 Buturac, G. (2013), “Beyond the global recession: Mutual trade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2):275—289.
 Ceglowski, J. & S. Golub(2011), “Does China still have a labor cost advantag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12(3): 36—45.
 Chinn, M. et al(2014), “A forensic analysis of global imbalanc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6(2):465—490.
 Constantinescu, C. et al(2014), “Slow trade”, *Finance & Development* 51(4):36—59.
 Constantinescu, C. et al(2015),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158.
 Davies, G. (2013), “Why world trade growth has lost its mojo”, *Financial Times Blog*, 29 Sept.
 Donnan, S. (2014), “OECD warns on global trade slowdown”, *Financial Times*, 27 May 2014.
 Duval, R. et al(2014), “Trade integration and business cy-

- cle synchronization: A reappraisal with focus on Asia”, IMF Working Paper, No. 14/52.
- Engel, C. & J. Wang (2012),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urable goods: Understanding volatility, cyclical, and elastic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3(1):37–52.
- Escaith, H. & S. Miroudot (2015), “World trade and income remain exposed to gravit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36(2):127–160.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Understanding the weakness in global trade”,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European Commission (DG ECFIN), Winter, Box 1.1.
- Evenett, S. (2011), “Did WTO rules restrain protectionism during the recent systemic crisi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8687, London.
- Evenett, S. (2013), “Five more years of the G20 stand still on protectionism?”, VoxEU.org, 3 Sept.
- Freund, C. (2009), “The trade response to global downturns: Historic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015.
- Gangnes, B. et al (2014),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rade elasticity”, *Economics Letters* 124(1):482–486.
- Gaulier, G. et al (2013), “Market Share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The quarterly export competitiveness database”, Banque de France Working Paper, No. 472, Paris.
- Gawande, K. et al (2015),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9(1):102–28.
- Goldberg, P. et al (2010),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4):1727–1767.
- Hoekman, B. (2016),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 eBook*, London: CEPR Press and EUI.
- Houseman, S. & M. Mandel (2015), *Measuring Globalization: Better Trade Statistics for Better Policy*, Kalamazoo: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Press.
- Hummels, D. et al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1):75–96.
- IMF (201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Legacies, Clouds and Uncertainties*, Update, Jan.
- Jafari, Y. & D. Tarr (2014), “Estimates of ad valorem equivalents of barriers against foreign suppliers of services in eleven services sectors and 103 count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096.
- Jensen, B. & L. Kletzer (2006), “Tradable services: Understanding the scope and impact of services off-shoring”, in: S. Collins & L. Brainard (eds), *Brookings Trade Forum 2005, Off-shoring White Collar Work*,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Kee, H. L. & H. Tang (2014),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mimeo,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Kee, H. L. et al (2013), “Is protectionism on the rise? Assessing national trade policies during the crisis of 2008”,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4):342–346.
- Lemoine, F. et al (2015), “L’usine du monde au ralenti ou le changement de régime du commerce extérieur chinois”, CEPII Working Paper, No. 4.
- Li, H. et al (2012),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57–74.
- Miroudot, S. et al (2013), “Measuring the co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World Trade Review* 12(4):719–735.
- OECD (2013), *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na*, Paris: OECD Publishing.
- OECD (2015), “International trade slows sharply in first quarter of 2015”, Press Release, 28 May.
- Ollivaud, P. & C. Schwellnus (2015), “Does the post-crisis weakness of global trade solely reflect weak demand?”,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1216.
- Feenstra, R. C. & S.-J. Wei (2010),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rinivasan, M. (2014), *Global Supply Chains: Evaluating Regions on an EPIC Framework - Economy, Politics, Infrastructure, and Competence*, McGraw-Hill.
- World Bank (2015), “What lies behind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Ch. 4 in: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WTO (2014), *World Trade Report 2014*, Geneva.
- Yoshitomi, M. (2003), *Post-crisis Development Paradigms in Asia*, Tokyo: ADBI.

(责任编辑:刘新波)